

刘成信/主编

中国杂文

ZHONGGUO ZAWEN

(百部) 卷三



鄢烈山集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刘成信/主编

ZHONGGUO
ZAWEN

中国杂文

(百部)卷三



鄢烈山集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杂文百部. 当代部分. 第3卷. 鄢烈山集 / 刘成信主编; 鄢烈山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1

ISBN 978-7-5463-9622-4

I. ①中… II. ①刘… ②鄢…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8942号

鄢烈山集

出版人 孙建军

作者 鄢烈山

主编 刘成信

责任编辑 马忠平 孟迎红

封面设计 梁文强

开本 650mm×950mm 1/16

字数 75 千字

印张 11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北方卡通漫画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话 总编办: 0431-86012915

发行科: 0431-86012770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9622-4

定价: 1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6012915

目录

假如祝英台做了母亲	1
论“我冤枉”	4
猴子与崇祯皇帝	7
唱情唱声君自知	10
颜闾博士如是说	13
哀陈伯达	17
孩子,你怎么会这样想	20
痴人说梦	26
哪朝哪代《纤夫的爱》	30
拒绝金庸	33
“波尔大哥”,永别了	35
学术与良心	39
续伊索寓言五则	43
高尚与卑鄙的组合	47
整顿坤纲	50
反刍《入关告谕》	53



“爱国贼”	57
杂文新概念:公民写作	61
“人”的挺立	66
“保护”中国男人	71
“建设性”是嘛玩艺儿?	75
贾樟柯论人权	83
权力痴呆症	86
地头蛇心态	89
王阿奶真的不简单	93
向阿卡耶夫致敬	97
唱不尽古今旷男怨	102
“服务”的权力与拒绝的权利	112
“贪生怕死”的权利	116
我怎么就不“震惊”?	126
坏的制度比坏的国王更坏	130
摆脱受害者心态	134
许三多是我们的“白日梦”	138
警觉自我感动	143
狗恶酒酸说“剩女”	147



同情小岗村已故书记沈浩的妻女	151
自我意识，还是自我中心？	155
“按闹分配”与剿抚传统	159

假如祝英台做了母亲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最喜爱的民间传说。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常使我如痴如醉。梁祝追求纯洁爱情坚贞不渝的精神动人心弦，他们的悲惨命运令人扼腕。然而，日前我忽生怪念：假如祝英台没有投坟、化蝶，而是不得已做了马太守的儿媳，时间缝合了她心灵的巨创，终于在马家生儿育女，她这个母亲会怎样对待儿女的婚事呢？

尽管，她对包办婚姻曾经痛心疾首，但她的女儿若要嫁给一个穷书生，她未必会恩准女儿的选择。痛苦的经历可以使人变得仁慈——将心比心地体贴人；也可以使人变得冷酷——我挺过来了，不也生活得蛮好吗？后一种情况往往发生得更多。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别令狐拾遗书》中曾满腔悲愤地指斥过这样的社会现象：“至其羔鹜（聘礼）在门，有不问贤不肖健病，而但论财货、恣求取为事。当其为女子时谁不恨？及为母妇则亦然。”同是一人，随着角色的转换，心情、态度竟会转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这种此一时彼一时的现象不仅表现在家庭圈子



里,社会生活中同样存在。农民起义的领袖,从陈胜到洪秀全,都是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斗士。然而,一旦他们成了“人主”,对森严的封建等级制的钟爱,对骄奢淫逸生活的贪恋,比起被推翻的帝王来毫不逊色。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不仅在古代是普遍现象,当代也不乏其例。有的人在担任领导职务前,为群众办事热心快肠,对官僚主义作风愤恨之情溢于言表,克己奉公,不慕虚荣,不谋私利;而一旦有了“顶戴花翎”,想的是固位升官,做的是表面文章,滥用权力摆老爷架子、谋一己之私,仿佛被施了魔法,正应了一句老话:“世人不作官,做官都一般。”有的知识分子曾饱受妒贤忌能的当代王伦的压抑,而他当了“首领”之后,整起可能超过自己的知识分子来“决不心慈手软”。有的作家以反特权的作品成名,而成名之后争起座次、宾馆规格来竟也“当仁不让”。更常见的是,没权没机会时,谁都反对“开后门”,而自己“开后门”时就一点也不客气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文化心理现象。简单地指责为“两面派作风”,恐怕大家都难以信服。我想,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社会环境的因素,也反映了人类的某些弱点。要想改变这种现象,光靠“三不主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类的劝谕,历史证明很难奏效。既

靠思想道德教育,更新观念,更靠建立健全的合理的规章制度,两者结合使人们有了新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庶几可以避免人格分裂的现象?

【原载 1988 年 1 月 25 日《天津日报》】



论“我冤枉”

从前,我很容易受感动。而最能教我有动于衷“珠泪涟涟”的,是那句用哭腔拖板吟叫的:“我——冤——枉——啊!”

我发现这个“我冤枉”是旧戏曲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台词。清官戏中是必有的,或披发跣足击鼓喊冤,或踉踉跄跄拦轿喊冤,或公堂猛然转首凄然一呼;忠臣戏里是必有的,或面对昏君恨不能剖心掏肺,或面对权奸发誓化为厉鬼雪耻伸冤;一些鬼戏如《李慧娘》(其祖本是明人的《红梅记》)少不了喊冤;一些别的不好归类的戏也有大喊“我冤枉”的,如京戏《野猪林》(祖本是明代的《宝剑记》)中林冲在高俅的白虎堂被擒后,一边“甩发”一边唱道:“万不想被陆贼引入陷阱,到如今这冤屈何处能伸”(西皮散板),就曾令我感极而泣。

可以说,“我冤枉”的主题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大多数有“人民性”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正是中国民众可怜的生存状态的真实反映。那些呼天抢地的“悲愤诗”、“感遇赋”固然喊的是“我冤枉”,那些吟咏“知音难觅”、“美人迟暮”的雅歌也无非是好货没卖好价幽怨之



声。从屈原的《离骚》仰天诉告“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到当代小说《血色黄昏》中主人公林鸽的义愤填膺，一脉相承，都是“我冤枉”的古调。从那些呼唤“理解”，倾诉不得知己为之而死的新声里，我听出的也都是“我冤枉”的旋律，不过是变奏而已。

恐怕不能说爱喊“我冤枉”的人，是利用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在赚观众的眼泪或故作清白无辜之态诱人怜惜。“我冤枉”，实在是国人遇到社会不公时一种接近本能的条件反射，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思维定势。这种反应，这种思维模式，只关注“我”的命运，仿佛真是偶然的因素造成了阴差阳错，或个别心术不正的小人颠倒了本来昭如日月的是非。所以，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明镜高悬”的法官身上，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洞察一切”的明君圣主身上。

所以，他们即使身受过暴虐和欺骗，但对别的“罪犯”的犯罪是并不怀疑的：“世上人千千万万不去冤枉，偏偏要冤枉他？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他要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怎么会惊官动府呢！”至今，许多人还信守着“屈死不告状”的古训，总认为沾了官司的就不是好人。这种观念与“我冤枉”的思维可谓殊流同源。这也正是“我冤枉”可怕的另一面：“你”不冤枉！

“我冤枉”，其实往往并不冤枉：无辜小民被冤正是以言代法、生死系于个别官吏的清浊智愚的必然结果；“忠



臣”被斥正是国家大事听凭独裁者的喜怒哀乐发落的必然结果；个人的不被“理解”就冤抑终生正是人身依附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那还是在“文革”以后两三年，我观看外国电影《基督山恩仇记》，其中有段台词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是法利亚长老在伊夫堡的地牢里对青年囚徒邓蒂斯讲的。邓蒂斯悲愤地对法利亚说：“没想到我会有这样的遭遇！”长老轻轻地摇摇头，平静地说：“正因为你和许多人没有想到，所以灾难就降临了。”这位博学睿智的学者和爱国志士的思维的确高人一筹。我理解他的话至少有以下几层意思：“没有想到”往往是“我冤枉”的前奏曲；在不怀疑现存秩序和规范（自然有整体结构与局部细节之别）的大前提下，捶胸顿足的鸣冤未免滑稽；只有大家想到现存制度可能有纰漏，并努力完善它，减少可能发生的弊病，才能避免蒙受不白之冤；如果尽其在我而尚不能杜绝悲剧发生，我们也就不用不着悲愤满腔了。

我想以此言赠给那些已喊将喊或想喊而终于未喊出“我冤枉”的同胞，不一定是涉及刑事案件的。

【原载 1990 年 7 月 14 日《大公报》】



猴子与崇祯皇帝

凡是挂“动物园”牌子的地方，展出的动物总有猴子。猴子虽不像熊猫、斑马那么稀奇，但最惹人喜欢。我儿子每回到动物园，总是在“猴山”旁逗留的时间最久。看它们攀援腾挪，看它们母子承欢，看它们举爪送食，看它们一本正经地捉虱子……

有一回，看了好半天，儿子大惑不解地问我：“那两个猴子在自己身上找什么吃呀？没完没了地找！”我说是在捉虱子。儿子愈发莫名其妙了，问“捉狮子？”——他压根儿没有“虱子”的概念。我跟他解释，“虱子”是寄生在猴子身上的一种小动物，并借题发挥咋唬道：“你要不讲卫生，也会像猴子一样喂虱子的，痒死你！”儿子瞪着眼睛说我身上没毛它藏哪里？我告诉他藏在衣被和头发里，他说：“我把衣服被子都放到锅里煮，煮死它，再学和尚剃个光头！”我又给他出了几道难题，他把大人灭蚊灭鼠灭蟑螂的法子全搬来化解，我不得不承认那是可以战胜虱子的。

人，不愧是万物的灵长！即使是小孩子，其思维也比千年老猴精高明。猴子无论多么机敏聪慧，它们对付虱子



就只有祖传的办法一个：“勤拿！”它们的思维只能及于一个个直观的虱子，而不能像人一样采取战略性的方略将虱子“一网打尽”，更想不到设法预防虱子，从根本上杜绝之。当然，人的思维功能的发挥是有前提的。拿灭虱子来说吧，首先他得恨虱子，誓不与之和平共处，若是以“扪虱而谈”为荣，借此笑傲王侯，或以“舍身饲虱”为仁，借此修德炼性，或抱着“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态度得过且过，那就另当别论。

然而，细细想来，说人的思维远远高出猴子也未必尽然。有些事——比如说肃贪惩墨——很像灭虱子；有些人——比如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思维就跟猴子处于同一层面。

崇祯皇帝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正所谓“民心如火炮，捻一点烈焰蔽天；国势似溃瓜，手一触流汁满地”。他下定决心重振朝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不可谓不卖力尽心，但每每“举措失当，制置乖方”。其所以然，与他的思维缺陷大有关系。以整顿吏治而言，他是够严厉的，一旦发现谁贪污受贿决不宽贷，即便是内阁首辅，也立即“着革职逮问”！可惜他就像猴子捉虱子一样，只知道抓到一个咬死一个。

有一回，“给事中”（七品言官）韩一良上了个“劝廉惩贪”的奏疏，“深当圣意”。崇祯以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拟破格擢用他为“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然而一召



对崇祯就翻了脸。原来他并不重视“开之其源，导之有流”的主张，硬是让韩一良指名道姓说出是何人在“交际”，何人曾纳贿，也就是说把他的建议书当了举报信！韩称他是援言官可以风闻奏事之例在泛论一般，竟惹得龙颜大怒。韩疏中曾恳切地以亲身经历作推断的依据，云：“臣素不爱钱，而钱自至，据臣两月内，辞却书帕已五百余金。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金，他可知矣。”崇祯又抓住这几句话厉声喝问：“此五百金何人所馈？”一良对：“臣有交际簿在。”崇祯追问姓名不舍，面叱不知所措的韩一良“显是肺肠大换！”官自然是升不成了，皇恩浩荡，“念及言官，姑饶这遭”，免于“拿问”！

这位“庄愍烈皇帝”当然是知道“正本清源”、“补苴罅漏”之类“提法”的，可事到临头就糊涂了，终于劳而无功，抱恨终天。就这位皇帝在明代中后期还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明白主子呢！他本人也一向以圣主明君自诩，至死都不承认自己的治国方略有什么不妥当，上吊之前还挺委屈地书衣襟曰：“皆诸臣误朕。”

可见人是多么容易堕入“沐猴而冠”的可悲境地而不自知！

【原载 1990 年 7 月 22 日《大公报》】



唱情唱声君自知

——也谈“老歌缘何起新潮”

去年毛泽东诞辰九十八周年前后,某公司推出一盒新录制的音带《红太阳》,据说“旋即走俏大江南北”。(“走俏”这个词儿时代感特强)另一音像出版社看准行情,提前两年为“隆重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赶制出《大救星》的盒带面市。这些歌带如果是一般的流行歌曲新品种,潮涨潮落两由之,勿庸饶舌。因全是六十年代前后的歌曲,它们的再度风行便被一些人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现在见诸传媒的基本上是喝彩声,不只在音乐的层面上,而且在政治与道德的“高度”:有说表达了集体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献身精神等“共和国传统价值观”的;有说四十岁左右及更大岁数的人找到了“音乐空间”的;甚至说“这样可以引导我们的作曲家写出一些健康的、有意义的通俗歌曲来”,等等。

听众为何爱听这些歌,各人心知肚明。“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白居易《问杨琼》)我猜,年轻人爱听这些父辈烂熟的歌,无非是对港台风味甜蜜粘乎的“爱啊想啊”和不死不活的“愁呀闷呀”听腻了,姑且换换口味;或许是出于好奇,感到新鲜有趣。长长见识,变变花



色，倒也无妨。

而我，是有幸被列入“众多三十五岁以上的人”之一的。坦白招供，至今我最爱哼的两首歌，一是“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一是“公社是棵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至于“就是好就是好”什么的，也可以唱“全本”。我有时不知不觉就唱起了它们，这主要是因为我对它们太熟悉太熟悉，那旋律已占据了我的“音乐空间”。就像慈禧太后爱听《马赛曲》，并不表明她赞成革命一样，我决不留恋吞噬了我一生最宝贵年华的“文革”。而这些被选中复出的歌曲可以说是“文革”的前奏曲、进行曲和颂歌；有些歌则是“文革”中应运而生，歌颂“文革”的。

我唱起这些“老歌”，有时是调侃的——庆幸那个可诅咒的时期的结束；有时是凄伤愧疚的，绝对没有今不如昔的感喟，没有对年轻一代的优越感——我深切地意识到，我们这些四十岁左右以及更大岁数的人，在中华民族面临十年浩劫之前没能阻止悲剧发生；如果我们当时奉行的那种“理想境界主义”（实是幼稚狂热），真的那么有价值，就不会导致全国内乱；个人崇拜的丧失理性与“文攻武卫”的野蛮，并非魔法呼唤的瞬间场景，乃是中国社会当时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必然的发生。

也许，真有不少人喜爱一些“战地新歌”是怀旧。这种病态心理任何时代都有，尤其处于社会大变革之时，不足